

## 专刊导言

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刘跃进

本期专刊围绕着文学文献问题刊发十四篇文章,研究对象从北宋西湖莲社到现代鲁迅、陈寅恪的著作,时间跨度很大。从选题类型看,这十四篇文章大致可以分为三类。

其一是对新见文献的考辨。近年从韩国流归国内的《杭州西湖昭庆寺结莲社集》是宋刻孤本,根据这个本子,陈斐对西湖莲社的社集编纂情况做了稽考。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元刻孤本《秋堂邵先生文集》,由于作者不详,所收二百余首诗亦为《全元诗》失收。罗鹭考出该书作者是元人王旭的友人,名不详,字伯诚,号秋堂,山西泽州人,解决了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。黄成蔚《彭宗孟〈侍御公诗集〉考论》,从版本信息、交游唱和入手,通过明末彭宗孟《侍御公诗集》考察了晚明党争的复杂情况。澹归是一位诗僧,在明末清初江浙及岭南文坛有一定影响。其著述丰富,可惜在乾隆年间遭遇禁毁。薛涓、谢谦从笔记史料及方志等文献中,辑录出澹归散佚诗歌十二首,残联一句,文两篇,多为澹归出家前或出家初期作品,颇有鲠慨不平之气,丰富了澹归研究资料。吴留营《江户写本〈使琉球赠言〉与康熙中期文坛》涉及到琉球历史。2013年5月8日《人民日报》刊发张海鹏《论〈马关条约〉与钓鱼岛问题》一文,谈到“历史上悬而未决的琉球问题也到了可以再议的时候”。文章发表后,在海内外产生强烈反响。其后,他又为《琉球救国请愿书整理与研究(1876—1885)》(新华出版社,2018年)作序,再次呼吁学术界关注琉球问题。吴留营特别指出,康熙间三次册封琉球,尤以康熙二十一年(1682)汪楫为正使、林麟焄为副使的册封之行,留下的诗文资料最为丰富。汪楫将同僚及亲友陆续赋诗题序汇为一编,作者多至180余人。这些资料的意义自是不言而喻的。有关《儒林外史》的文献资料,近年时有发现。朱泽宝《新见〈增补儒林外史眉评〉考论》则就他所发现的清末文人童叶庚的《增补儒林外史眉评》展开讨论。吴密《新发现鲁迅致曹靖华书简及〈河南卢氏曹先生教泽

碑文》手稿》以轻松的笔调追溯一段历史。

王国维在《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》的演讲中说:“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。”新文献的发现与研究,从来都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话题。当然,新文献,未必就一定有新价值。最近四十年,考古文献、域外文献、电子文献不断涌现,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,但并未颠覆或者改变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认识,这一事实,值得思考。

其二是对前人已有研究的澄清与考辨。《玉壶野史》有“生旦杂处”一语,研究者可以用来证明南唐时已有“生”“旦”脚色,是关于生旦脚色的最早记载。林杰祥《〈玉壶野史〉“生旦杂处”考辨》不赞同此说。她梳理该书历代版本流变,说明该书在明初后五卷阙佚,嘉靖年间抄补时已有阙文,留空格作“生口杂处”,参酌《南唐书》《宋史》《续通志》的相关记载,“生口”之本意当为“生徒”“门生”,故此语不可作为南唐时已有生旦脚色之依据。此处虽仅有一字之别,却关乎戏曲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。《九家集注杜诗》三十六卷,南宋郭知达编,是现存最早的杜甫诗歌注本之一。龙伟业《〈九家集注杜诗〉版本疑点考辨》认为,世间通行的所谓“乾隆武英殿刻本”“乾隆武英殿聚珍本”及其“嘉庆时翻刻之本”,实皆嘉庆八年武英殿刻本,所谓“元明间刻本”并不存在。这两篇文章的作者皆从版本入手,在版本差异中发现问题,说明从事版本研究不仅仅是简单的比对之学,也有方法论意义。邓晓东《明清以来唐寅文集误收及著作权有争议者考论》梳理了明清以来唐寅文集刊行情况,重点分析了文集中著作权有疑问的诗文作品,并分析其内在的原因,可以视为一家之说。《都门纪变百咏》是庚子事变时期的重要典籍,高春花《〈都门纪变百咏〉考论》考定作者为夏曰琦和庄礼本,并对其生卒年作了探索。

其三通过对前人研究进行梳理,将一种或一类文献的基本问题解决清楚。曾祥波《宋元“集注批点杜集”成书及其价值发微》以《须溪批点杜工部诗注》《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》《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》三书为例,梳理了宋元“集注批点杜集”的成书过程,比类参证,论析得失,视野比较开阔。李家桥《王国维抄校〈录鬼簿〉考》引入《录鬼簿》分藏各处的五种版本,探明了王氏抄校的目的以及最终放弃刊刻的原因。艾俊川《陈寅恪〈论再生缘〉补证》使用家谱资料补充了《论再生缘》中如陈端生父母的家世等若干细节问题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我留在文学研究所工作,曹道衡、沈玉成两位先生交给我的第一项学术工作,就是编纂《中古文学文献学》。书名有些拗口,是沈先生审定的,我也认可,在“引言”中,将古代文学研究分为文学阐释学和文学文献学“两大阵地”。文学阐释学涉及思想的阐释,艺术的赏析等,有较

多的主观色彩。这种阐释,有时符合作者的本意,但很多情况下往往是读者自己的理解,甚至与作者的本意南辕北辙。所以古人说,诗无达诂,作者用一致之思,而读者各以其情得之。有一千个读者,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文学阐释学,很可能是无边的学问。文学文献学则不然。它主要涉及作家生平、作品本事、文字训释等,相对来讲比较客观。所以,文学文献学是有边界的学问。我研究古典文学,更倾向于用文献学的方法。第一本论文集取名《古典文学文献学丛稿》,在“文献”后缀一“学”字,不过是给自己壮胆,好像有体系似的,其实并无深意。无论做什么研究,读书识字是第一步,古人称之为“小学”,今天叫文字、音韵、训诂之学,实为专精之学。小学之后推衍文意,便是义理、考据、词章之学,如果能够提出自己的见解,大约就可以算作研究了。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,今天重新组合,分为文学、历史、哲学等门类。古今分类的变化,只是表明研究对象的不同,而研究的途径并无二致。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,我们不十分重视文献学,视为繁琐,以为掌握了某种先进的思想方法,就可以升堂入室,抓住中国文化的精髓。为此,我们曾“东倒西歪”,到处寻找这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宝。追寻的结果,是与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渐行渐远。研究中国的学问,说一千道一万,都得从最基本的文献搜集整理工作做起。离开基本文献空谈义理词章,如同在沙滩上盖楼,根本靠不住。所以我曾说过“偏激”的话:谁绕开文献,学术史就一定绕开他。

文学文献学当然要严谨求实,但终究是为文学研究服务的。文学阐释学,既然是一门学问,就不宜天马行空,遨游无际,终究还要建立在文献考订基础上才有意义,所以,文学阐释学又是有限的。当然,无论是文学文献学还是文学阐释学,其核心是文学;而文学的核心是人本身。马克思《〈黑格尔法哲学批判〉导言》说:“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,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;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,也会变成物质力量。理论只要说服人,就能掌握群众;而理论只要彻底,就能说服人。所谓彻底,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。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。”理论的意义,经典作家给予了最经典的阐释。

上述十四篇文章,研究对象主要是文学家或文学作品,所以统称文学文献研究。这些文章,研究方法比较传统,所得结论也很平实,并无惊人之论。但他们努力用材料说话,少做主观臆断。这就为进一步的研究,奠定了坚实的基础,拓宽了前进的道路。